



炎帝文化研究

第十四辑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 黄帝陵基金会 ● 炎帝陵基金会 主办
主编 赵德润

大象出版社



炎黄文化研究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 黄帝陵基金会 • 炎帝陵基金会 主办

主编 赵德润

第十四辑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炎黄文化研究. 第14辑/赵德润主编.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347 - 7198 - 9

I. ①炎… II. ①赵…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9008 号

炎黄文化研究 第14辑

赵德润 主编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吴韶明

责任校对 杨志平

装帧设计 王翠云 美霖

监 制 杨吉哲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18号 邮政编码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省罗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87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1.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北一路30号

邮政编码 450016

电话 (0371)66781503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张岂之	方克立	石兴邦	韩伟	文选德
主任	张文彬	孙天义	石玉珍		
副主任	赵德润	强文祥	邓德芳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震中	邓玲玲	刘宝才	肖云儒	何炳武
	张建功	邵小强	郑万耕	耿相新	曹敬庄
主编	赵德润				
副主编	王震中	邵小强	张建功		
编辑部主任	张 肿				

目 录

专 论

名士直言一甲子

——中央文史研究馆六十年 赵德润\1

“国学”或“古典学”视野下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方光华\14

炎黄二帝及其时代

五帝古史传说研究 王震中\18

炎黄学论纲 霍彦儒\52

中华人类与远古文明探源

——基于武陵山地域的考据分析 丁孟春 罗先明 熊柏隆\67

试论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的认同 谭 云\87

羊头山是神农氏族的起源地

——略论高平所出土各代古碑记载之“烈山” 李 津 杨振贤\93

思潮与学派

关于阳明心学的研究方法 方尔加\96

葛洪的思想来源及其前期道论 王启发\109

文化丛谈

大禹图强拓疆考 李养民\128

清朝总兵张鹏程、张玉麒父子身世考 李春元\138

改进炎帝陵祭奠 促进炎帝陵旅游 谭伟平\146

文物与考古

阿房宫的印象

——对杜牧《阿房宫赋》的双重误读 明 辉\149

史前黄河流域奠基现象研究 李银良\159

文献整理与研究

《周易》“藉用白茅”述论 辛亚民\170

《国语·齐语》与《管子·小匡》辨析 张连伟\179

《文心雕龙》与汉代儒学	朱 清\184
-------------------	---------

中外文化交流

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与俄国汉学的奠基人

——比丘林生平与学术贡献	李伟丽\193
--------------------	---------

探索与争鸣

向仁存在——孔子开辟的人生方向	陈占国\221
-----------------------	---------

论孟子的道德优先意识与民生思想	孔德立\231
-----------------------	---------

东晋宗教政策述论	张 健\238
----------------	---------

啬夫小考	赵茜苒\247
------------	---------

中华学人

石峻及其学术思想述略	杨庆中\256
------------------	---------

书评与序跋

《阅读中华国粹经典》前言	傅璇琮\268
--------------------	---------

《子藏》总序	方 勇\271
--------------	---------

走进历史深处

——《周代礼乐文明实证》评介	罗澹英\278
----------------------	---------

学术访谈

今天该如何评价儒学：制度儒学与草根儒学

——“中西马”对话实录(二)	牟钟鉴 李德顺等\283
----------------------	--------------

学术动态

传承书院文化 开拓书院未来

——“书院文化的传承与开拓”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邓洪波 蒋紫云\297
-------	-------------

“黄帝旗帜·辛亥革命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综述	曹振明\302
-------------------------------	---------

名士直言一甲子

——中央文史研究馆六十年

◇赵德润

1948年10月的一个晚上,在西柏坡,周恩来亲自携灯在村口迎接一位尊贵的客人,而毛泽东主席则站在院中静静地等候着。这位客人就是毛主席的恩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符定一老先生。

此时西柏坡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们,正在为解放全中国、建立新政权而紧张工作着。百忙之中,毛泽东与到访的符老先生谈起将来进城后要设置一个机构,对德高望重的老年知识分子妥善安排,发挥他们独特的作用。毛泽东所说的机构,就是1951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

其作始也简 其将毕也巨

1951年7月29日这一天,在北海公园静心斋,聚集着几十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们平均年龄70岁,最年长者90岁,有清末翰林、进士、举人,有名学者、名画家、名医师,多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社会名流。

尽管当日天气炎热,但是先生们均身着正装和长衫,之所以如此隆重,是由于他们盼望已久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在这一天正式成立了。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到会致辞,称此次盛会“自古以来罕与其匹”。他引用庄子的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预言文史馆的工作大有发展的前途。

为了这一时刻,许多志士仁人曾为之奔走,柳亚子就是其中一个。

1949年,当柳亚子先生听说要筹建中央文史研究馆的消息后,曾经致信给毛主席,建议设立“国史馆”,修撰“南明史、中华民国专史”。毛主席在回信中,肯定了有成立文史研究机构的想法,但是他并不赞成成立文史馆仅仅是为了研究南明史和中华民国史。通古博今的毛泽东有着更为宏观的设想。正如后来启功馆长所说,中央文史研究馆好比当代翰林院。历史上翰林院是为封建王朝服务的,而当代文史馆是为人民服务的。

中央文史研究馆已经走过六十个春秋,前后经历符定一、章士钊、杨东莼、叶圣陶、萧乾、启功、袁行霈七位馆长。馆长是文史馆的一面旗帜。决定设立文史

馆以后,馆长的人选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毛泽东经慎重考虑决定举荐符定一先生出任文史馆第一任馆长。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这位老人一生有三大贡献:一是发现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有用人才之第一人;二是建党初期,支持党的活动,营救党的领袖;三是晚年参加反蒋斗争,对建设新中国有贡献。”

为了让符定一先生同意出任馆长,毛泽东巧妙进行了动员。毛泽东与符定一先生的交谈还引出了馆员遴选标准。

有一次,毛泽东设家宴招待符定一先生和几位同乡前辈,席间通报了设置中央文史研究馆的想法,动员符定一先生出任馆长。老先生开始认为这一单位无非是“文、老、贫”,毛泽东笑着说:“不光文、老、贫,还有德、才、望!这个事还需要您这样有学问和德高望重的人啊!”

决定接受馆长一职以后,符定一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筹备成立文史馆的工作中。他发现北京客居着一大批名望高、年纪大的文化人,他们在生活上比较困难,迫切盼望政府的救济,也希望能为社会做一些事情。老先生们对政府将要设置的文史馆充满期待,在大家的恳求下,符定一于1951年6月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尽快批准成立文史馆以解燃眉之急。

毛主席于6月26日收到来信,在“先发表一批老人名单,先期照单接济,免得老人缘门乞食也”的文字右边画了线,并在信上批示:“请齐燕铭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毛泽东 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的批示,使京城一大批有名望的老年知识分子得到接济,同时也大大加快了文史馆的筹备进程。

1951年7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成立,周恩来聘请符定一为文史馆首任馆长,柳亚子、叶恭绰、章士钊被聘为副馆长,另有26位各界名宿成为首批馆员。

自此,从馆长到馆员,均由总理亲自聘任并颁发聘书。受聘者多为耆年硕学之士、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而总理每年至少要同馆员见一次面,或将其请到中南海,或亲自到文史馆,当面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成为文史馆馆员?毛泽东当年给秘书田家英的一封信作了最好的诠释。

文史馆成立之初,有人推荐杨开慧的朋友、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时在长沙任中学教员的李淑一到文史馆任馆员,希望毛主席能够向文史馆推荐一下。

毛泽东在1954年3月2日就这件事专门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从这封给秘书田家英的信里,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自知之明”,他不是不

想推荐,而是不好意思再推荐了。原因是“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在这里,毛泽东丝毫没有怪罪谁的意思,而是把自己“数荐不纳”的原因归结为“文史馆资格颇严”,可见他对文史馆的敬重。23 年后的 1977 年,李淑一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央文史研究馆的成立也为地方文史研究馆的出现提供了契机。长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史研究馆和中央文史研究馆互相配合,在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各省市文史研究馆的建立是在邓小平主持下决定的。

1952 年 8 月 17 日,邓小平副总理向毛泽东主席报告拟在各省市设立文史馆。毛主席 8 月 18 日即作出批示:“刘(少奇)阅,退邓办。同意这个决定。”

1952 年 9 月 5 日,在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代总理邓小平主持政务院第 149 次会议,讨论批准在全国各地设置文史研究馆的问题。

随后的几年里,在各大行政区的周密部署下,各省市及部分省辖市文史研究馆相继成立。

敬老崇文 一脉相承

距天安门广场 200 米,前门东大街 11 号,有一处幽静院落。这里是人民政府礼贤敬士之所、名著硕儒汇聚之处——中央文史研究馆。在南楼大厅正面墙上镶嵌着两行金色大字,那是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的“发扬爱国精神,弘扬民族文化”。对面墙上,便是朱镕基同志讲话中强调的“敬老崇文,尊贤敬德”八个大字。而这栋南楼正是朱镕基任副总理时听说文史馆办公室紧缺而拨款修建的。

进到中央文史研究馆,自然会融入到“敬老崇文”的传统之中。文史馆有“序齿不序爵”的不成文规定:无论何党何派,正部副部,专家学者,入馆一律以先生相称,以年龄大小“排座次”。而“敬老崇文”的传统,从建馆之初就开始了。

毛泽东主席对符定一先生非常尊重,除了有时到先生家中看望外,还邀请先生可随时到中南海往访。每次会面,毛主席都用自己的专车接送。有一次,老先生从中南海回到家就对家人说:“中南海我不能多去了,毛主席把我送上车,车子一开就给我鞠躬,都走出老远了,我回头一看,毛主席还弯着腰行礼,这让我怎么承受得起呀!”

周恩来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真可谓日理万机,连毛泽东都说“周公确有吐握之劳”,他那样忙,也没忘记亲自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选址。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址最早选在故宫里,后改在北海静心斋。静心斋建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占地面积 4700 平方米,原是皇太子读书的地方,园内亭榭楼阁,小桥流水,叠石岩洞,幽雅宁静,是一座建筑别致、风格独特的“园中之园”。为了给老先生们腾馆址,静心斋内珍贵的文化典籍被搬到了故宫博物院,前后费时一年

多。1951年7月,静心斋正式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办公地。1974年,国务院参事室从中南海迁到静心斋,同中央文史研究馆合署办公。1981年11月,静心斋归还北海公园,对游人开放,中央文史研究馆和国务院参事室迁至现址东交民巷使馆区原荷兰使馆——前门东大街11号。

周恩来总理为齐白石老人搬家的故事,也被传为佳话。

1950年秋,周恩来总理偶然了解到,跨车胡同15号齐白石的住宅年久失修,又破又漏,且有坍塌的危险,便命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人加以修缮。除部分房屋翻盖外,其余的也粉刷一新,并在南院挖了一个三米多深、两米见方的渗水坑,解决了多年来院内无法排水的问题。白石老人对此由衷感谢,这是他一生都没有见过的事,自己未花一分钱,房子就修好了,解决了生活上的不便。

为了使白石老人能有一个更舒适、宁静的环境,能在茶余饭后悠然散步,颐养天年,又能使来访的客人不致感到拥挤,1955年秋天,周恩来总理委托文化部和全国美术家协会在地安门雨儿胡同买了一所旧王府作为白石老人的住宅。白石老人一生从未受到过如此厚重的礼遇,他怀着无限感激之情,几次对前来探望的朋友指着修饰一新的房子,感慨万端地说:“我多么希望能活到120岁,多给人民贡献点薄艺,于心才安。”

住在宽敞、明亮的雨儿胡同住宅里,白石老人感到欣慰,他不停地挥笔作画。可是日子久了,一向喜欢和家人在一起的白石老人,不免产生了孤独的感觉,他希望搬回跨车胡同,和家人一起安度晚年。于是在1956年春天一个和煦晴朗的中午,白石老人又来到中南海,把要搬回跨车胡同的想法告诉了周总理,总理非常体谅老人的苦衷,随即答应说:“我现在就送您去。”周恩来总理亲自将白石老人送回了跨车胡同。

晚上,白石老人精心地画了一幅红红的大牡丹画纪念这一天。第二天早上,他又挑选了一幅得意之作《荷兰鸽子》,专程派人送到中南海,送给了周恩来总理,以表达他的感激之情。

毛泽东酷爱诗词,经常与学识渊博的文史馆馆员交流切磋。1961年11月6日,他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有一首七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时隔不久,毛主席又补充道:“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到处栽。雪里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毛主席急着要找到这首诗的出处,核对记忆误差,以便推陈出新。作为一个诗人,记不清古人诗句或出处是常有的事。但在急迫之中,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最直接、最重要的文史馆老先生们,由此可见中央文史研究馆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分量。

六十年来,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从周恩来、李鹏、朱镕基到温家宝,以及分管文史馆工作的国务院领导董必武、习仲勋、罗干、王忠禹、华建敏、马凯,他们都一脉相承地重视文史馆工作,不断推进文史馆事业的创新和发展。

2010年8月6日,温家宝总理又一次走进中央文史研究馆。他这次是专程来馆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祝贺95岁寿辰的。此前,温总理给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打电话,关心饶宗颐先生的健康,安排饶老到北京医院检查身体。饶老此次来京乘坐的奥迪轿车“京A80880”,就是当年德国总理送给中国总理的国礼,温总理一天没坐就送到文史馆、参事室请老先生们坐。敬老崇文的传统美德,再次在这里彰显。

早在文史馆成立大会上,董必武曾说过:“昔日所传香山九老,洛社耆英,比之这次开馆也甚不相似,那种集会 is 前辈诸先生一时与会所至,自相集会,流连诗酒,以为雅事,优游逸豫,以娱暮年,他们是不关心世事的。”“香山九老”指的是唐代文人白居易等九位老者。他们因志趣相投,在洛阳香山结为九老会。北宋名相文彦博因慕“香山九老”,乃集合洛阳城中年高德重者,在资圣院修“耆英堂”,也留下了一段风雅韵事。但比之今日的中央文史研究馆,确实“甚不相似”。

是真名士 敢吐真言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言路闭塞,客观上促成了历代文人含蓄、深沉、内敛的性格,也使一些心灰意冷又不愿随波逐流的文人士大夫放弃了“忧天下”的人生态度而悄然出世,转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于是,隐山遁水便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文化现象,也给自然山水打上了浓浓的人文印记。而新中国的文史馆馆员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呢?答案自然是成为像魏徵一样敢于直谏的良臣,像司马迁一样秉笔直书的史官。

翻开中央文史研究馆六十年的历史,存史资政、敢于直言的故事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还要数章士钊先生。

1966年8月29日,一群“红卫兵”到史家胡同抄了章士钊馆长的家。第二天一早,章士钊致信毛主席反映遭遇,毛主席当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种行为,责令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物品,派人保护章宅。周恩来同时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近百位高级民主人士和老干部名单,恰恰是这份名单使这些民主人士和老干部免于“文革”劫难。

1967年3月上旬,章士钊馆长致信毛泽东主席。信中说,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刘少奇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毛主席于3月10日亲笔复信:“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

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是一部研究柳宗元文学和思想的学术著作。这部奇书的问世,很富有戏剧性。1971年9月,正值“文革”中期文化界万马齐喑的时代,《柳文指要》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出版,好似为文化禁锢的铁幕打开了一个缺口,在当时引起了惊世骇俗的震动。

1973年5月25日,92岁的章士钊先生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重托,在儿子章可、女儿章含之等陪同下,乘专机赴香港,利用探亲机会,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寻找途径,终因过度劳累,于7月1日在香港寓所病逝。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朱启钤,光绪举人,曾任北洋政府内阁代理总理,他又是工艺美术家、建筑学家和中国古建筑学奠基人,一生经历了清朝末年、北洋政府、民国、日伪、新中国五个历史时期。上海解放后,周恩来总理即派章文晋从上海将朱启钤接到北京。

朱启钤回京后,对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颇有好感。他是中兴轮船公司的董事长,经与公司的常务董事共同努力,把已经跑到香港的9条轮船召回大陆支援国内海运。

同时,朱启钤又将他珍藏的明岐阳王世家文物共56件捐献给政府。在这批文物中,《吴国公(即朱元璋)墨迹》、《张三丰画像》、明太祖御帕及纪恩册、《平番得胜图》等均极为珍贵。此举受到文化部嘉奖,捐献的文物则在故宫太和殿展出。

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市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征求朱启钤的意见。他建议天安门广场周围不要修建高于天安门城楼的建筑;扩建广场,移动华表时,要注意保护,特别是西边的那座华表,庚子时被打坏过,底座有钢箍,移动时要注意;广场上东西两面的“三座门”尽量不拆。这些建议,北京市大体上采纳了。东西“三座门”开始并没有拆除,后来因为有碍交通,才不得不把它们移走。

叶恭绰早年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叶恭绰于1951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同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5年任北京中国画院院长。叶恭绰生平于艺术、书画、诗词、文物鉴藏无不精通。为了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使之不流入外国人之手,他购买了许多珍贵字画、碑帖、瓷器、铜器、孤本、善本、外国难得之名著与故宫禁物。一次,他重金购得稀世珍品——晋朝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真迹,慨然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年登八十,他又先后将全部收藏品捐给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成都市的有关机构。尤其对国之重器毛公鼎的保护,叶恭绰功不可没。

沈尹默出身书香门第,曾自费留学日本,在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受业。归国

后,在北大任教并主持书法研究会。1916年,他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建议陈独秀将《新青年》从上海迁至北大,与陈独秀、胡适等轮流担任主编。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拜访的第一个民主人士就是沈尹默,并邀请他担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1960年7月,他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沈尹默书工四体,尤以行草著称,花费了一生精力,成为书法名家。其书圆润秀美,清雅遒健,流畅多姿,且不失严谨法度,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独树一帜,从者众多,对现代书坛影响也极大。

晚清探花商衍鎤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和学者,曾在国民政府任职。日寇侵占东三省时,他在《感愤》一诗中写道:“惊看砧肉供刀俎,忍撤藩篱逼冀燕。”并有“长蛇封豕欲难填”之句,痛斥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反动派的卖国政策。抗战期间他又愤怒声讨日寇滥炸和平城市的暴行;每闻捷报,则咏诗庆贺。他对国民党的苛政无比痛恨,曾以“斗米需钱百万多”成轱辘体长诗加以揭露。1960年他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党和政府对老年知识分子的关怀与照顾,使他感到温暖,多次赋诗抒怀,经过三年努力,撰写了一部23万字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全书材料翔实,内容丰富,填补了我国学术界的一项空白,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陈寅恪是清末著名进步政治家陈宝箴之孙、爱国诗人陈三立之子。1910年起赴多国留学,通晓十几种语言,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为人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晚年失明,在助手的帮助下,编成《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写有专著《柳如是传》、《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第五任馆长萧乾是著名记者和作家,曾任《大公报》战地记者,随盟军深入柏林,见证了第三帝国的覆灭,并写出了《到莱茵前线去》、《南德的暮秋》等大量战地报道。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授予他“抗战胜利老作家纪念馆牌”。晚年的萧乾,勤奋笔耕,写了大量的散文、笔记、随笔、回忆录等作品。萧乾的作品,真诚坦荡,深邃警醒,读来发人深省,耐人寻味。萧乾是用“心”写作的人。他多次说,自己这辈子的处世原则之一,就是讲真话。1999年底萧乾90寿辰前,《萧乾文集》出版。2000年1月27日,朱镕基总理致信祝贺:“感谢您赠我全套《萧乾文集》。先生毕生勤奋,耕耘文坛,著作等身,为中国之文学、新闻、编译事业作出宝贵贡献。我在中学时期,先生就是我的文学启蒙人之一,受益匪浅。”

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于一身的第六任馆长启功,满族,爱新觉罗氏,是清世宗(雍正)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是享誉国内外的国学大师,对古

代书画、碑帖见识卓异,造诣精深。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发表过有关的专文,曾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经他过目的古代艺术精品数以千计。由于他对历代作品的特征和作者的风格了然于心,加上他有丰富的文物知识和文史修养,又谙熟典故,劣品和赝品总逃不过他的眼睛。1983年,他成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

从文史馆成立以来,馆员们或资政建言,或著书立说,或潜心书画,或吟诗作赋,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2011年4月14日,在中南海紫光阁,温家宝总理向新聘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参事颁发聘书。85岁的清史学家戴逸,84岁的北大教授、北大儒学研究院院长汤一介,两位耆年硕学的新聘馆员格外引人注目。

随后,温总理在国务院小礼堂与馆员、参事座谈时,语重心长地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

温家宝引用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写过的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认为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的崇高精神追求,把这副对联用在今天馆员、参事们的身上也很贴切。这是温总理对馆员、参事参政议政的嘱托和勉励。

在座谈时,温总理还说:“上次座谈会我讲话时,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我—生都崇尚的格言。今天我们的参事、馆员从事调查研究,同过去关在书斋里做学问有很大的不同,要有不畏艰辛、不怕牺牲、求实崇真的精神,同样值得提倡‘千夫诺诺,不如—士谔谔’。我认为,深入实际而不浮躁,独立思考而不跟风,敢说真话而不人云亦云,这是参事、馆员人格魅力之所在,也是提高咨询国是水平的关键。”

温家宝提到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是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国学大师陈寅恪在王国维先生1927年沉湖两年后为其撰写的纪念碑铭中的两句话。而“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在文史馆馆员的身上并不鲜见。

纵观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历史,六十年的发展呈现“U”字形。建馆初期,中央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确定的办馆宗旨就是“敬老崇文,存史资政”,即坚持统战性、咨询性、荣誉性的统一。后来只是由于“左”的错误,国家在重大决策中不再重视和听取不同的声音,因此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咨询性受到很大削弱。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局面有了根本性改变。

中央文史研究馆和国务院参事室合署办公,—个党组。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党组书记陈进玉和馆长袁行霈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中央文史研究馆

的工作呈现出新的气象。陈进玉对新时期文史馆所具有的统战性、咨询性和荣誉性的定位及其相互关系有独到见解：从一定意义上说，统战性是基础，咨询性是关键，荣誉性是特征。没有统战性和荣誉性，咨询性就缺乏特色，缺乏权威；而没有咨询性，就不能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独特的作用，统战性和荣誉性也就失去了它们应有的意义。为确保馆员从实际出发，发挥参政议政、咨询国是的作用，陈进玉提出根据年龄和身体状况的不同，做到“从容淡定、因人而异、量力而行、各展所长”。

馆长袁行霈，北京大学教授，北大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华诗词研究院院长。袁先生长期在北大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李贺研究、唐宋词研究等课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应邀到日本东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讲学，受到广泛称赞。袁行霈和文史馆馆员们有同样的气质：温文尔雅中透出一种中国文人代代相传的风骨。总理每次召开馆员、参事座谈会，袁行霈的发言都切中时弊而又周密严谨。他关于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适应高校特点的管理方式和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建议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和教育部的重视。

馆员王蒙，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以他发人深省的作品，影响着广大读者。20世纪50年代，一篇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60年代调往新疆。1978年调回北京作协，历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1989年，他辞去文化部部长之职，专心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及大量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等。王蒙为讲真话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无怨无悔。他在一部著作序言中写道：“因为吾爱吾师吾友，但吾更爱真理，哪怕由于过分直言而被友人痛恨一时。请问，如果对于友人还不敢说实话，一辈子还有机会讲几句实话呢？而始终不讲实话，不是活活要憋死了吗？”他提出的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思考与建议，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要求相关部门结合“十二五”规划的编制，认真研究，深入调研，提出工作方案。

馆员舒乙参政议政的主要课题是保护文物、保护大运河，在现代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老北京。他执著地发言，写提案，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与政府有关领导和部门对话。舒乙致力于对城市文物及文化遗产的保护，惦记着那些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迅速消亡的老房子、老习俗、老文化，对那些打着保护的旗号疯狂破坏古文化、古建筑，却又大肆建筑新的伪文化、伪古迹者，深恶痛绝，痛心疾首。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可能地将那些体现一个城市灵魂的文化与文物保留下来。舒乙关于保护研究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建议，得到中央的重视，国家为此拨款六亿元人民币。

馆员韩美林，主持设计了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

专论 化和奥林匹克运动的结合,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五个“福娃”形象的创造灵感,来自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韩美林和艺术家们让它们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又具有抽象、变形的现代创新因素,韩美林也因此被称为“福娃之父”。

馆员王立平,《红楼梦》中许多经典歌曲的作曲家。曾任中国电影乐团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领导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并担任主席。他在创作一大批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歌曲的同时,为推动著作权法的制定、实施和完善做了大量工作。新版《红楼梦》筹拍时,有人问王立平会不会为新版电视剧《红楼梦》重写音乐,王立平肯定地说:“我不会再写《红楼梦》音乐,不是不想,不是不爱,而是我在创作中已经倾尽所有,如果不能写得更好,那为什么我还要写?”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文化瑰宝,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今后也总会有人重拍《红楼梦》,重写音乐。“我相信将来他们会拍得更好,音乐会写得更好。但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用我们的心血、智慧、勤奋筑起一道高墙,即便不会让后代望而生畏,也应该让他们感到想要超越没那么容易!”2010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音像著作权政策问题。温家宝总理没有拍板,他要求必须听听王立平的意见。王立平和谷建芬等维护作曲家版权的建议,最终促使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准备通过的相关规定的修改。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建议之所以引起重视,是因为先生们讲出了有水平的真话。

文化之研究 真理之讨论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多为饱学之士,在国家文化建设方面有独特优势。这里的文化显然是大文化概念,它是指国家、民族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和代表人物及由整体意识所辐射的一切活动。文化非同小可,正如北大教授、哲学家汤用彤先生的名言:“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

2007年至今,中央文史研究馆向国务院报送的馆员建议达40多份,涵盖了文史、艺术、经济、教育、文化遗产保护等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等领域。其中,程毅中、孙机、资中筠、程熙、杨力舟、赵仁珪、程大利等馆员分别就民族宗教、中小学教育、文化安全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提出建议,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均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相关部门予以重视。馆员们积极有为的资政建言对于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尽管文史馆馆员们来自不同党派或是无党派人士,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爱国热忱。无论是长江水灾还是汶川地震,馆员们都积极捐款或捐赠书画作品,以表达他们对灾区人民的关心和支持。

此外,文史馆馆员也经常到相关单位提出恳切的建议。2011年5月,20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和国务院参事走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提出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

翻开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历史,在德才望兼备的馆员中,既有书画家兼文史专家,也有文史专家兼书画家,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里大学问家同时又是书画家、书画鉴赏家的传承;中央文史研究馆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文史研究馆数千名精于翰墨的馆员,同社会各界的书画家们一道,在中华书画艺术的星空构成了一幅光辉灿烂的画图。

2008年8月15日,温家宝总理给中央文史研究馆孙天牧、欧阳中石、侯德昌、靳尚谊四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写信,祝贺《中华书画家》杂志创刊,希望杂志社以“弘扬经典,推崇大家”为己任,广泛团结海内外书画艺术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光添彩。

8月20日,《中华书画家》创刊座谈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召开。文化艺术界群贤毕至。国务委员马凯作了题为“传承、繁荣和发展中华书画艺术”的长篇讲话,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华书画家》的创刊,使中央文史研究馆终于有了自己的馆刊。这本从文史的视角观察书画的期刊,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成长为厚重典雅、特色鲜明、深受业界和读者欢迎的专业期刊。它所组织的活动也备受知识界、文化界和全社会的关注。

近年来,中央文史研究馆不断创新发展思路,拓宽发展渠道,促进资源整合,相继成立了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创办了《中华书画家》杂志和《国是咨询》杂志,还通过举办国学论坛和春节文化论坛等活动,积极筹办中国国学中心和中华诗词研究院等文化实体,为推动国家文化建设献计出力。这些工作的顺利开展,必将为中央文史研究馆更好地参与国家文化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2010年3月14日“两会”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讲了一个故事:“元朝有一位画家叫黄公望,他画了一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79岁完成,完成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几百年来,这幅画辗转流失,但现在我知道,一半放在杭州的博物馆,一半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画是如此,人何以堪。”

总理的这番期许,让元四家之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于660年后重新引起世人的关注,这一年是农历庚寅年。《富春山居图》画于庚寅年,断于庚寅年,名声鹊起也是庚寅年。

2010年4月,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华书画家》杂志社与北京优帕克公司合作,经浙江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授权,制成高仿真富春合璧图卷。5月,“《同根的文明》吟诵真赏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隆重举行。欧阳中石、程毅中、傅熹年、侯德昌、沈鹏五位馆员和馆长袁行霈登台吟诵。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以诗词爱好者的身份出席。7月,高仿真富春合璧图卷被首